

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现代的进展^{*}

陈其泰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高度发达。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有识史家依据时代条件的需要,对它进行了继承、改造,因而获得了新的进展,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已经凝固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典志体因注入了时代精神而凸显活力和20世纪“新综合体”的探索与运用。对此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全面揭示近现代史学演进历程,并在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获得哲理上的启示。

关键词 传统历史编纂学 典志体史书 “新综合体” 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时代条件变了,传统历史编纂学是否失去其价值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性和长期连续性举世无匹。在两千年的史学发展中,史家们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举其荦荦大者,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纲目体、会要体、史论等,各以独有的视角,或再现复杂的历史进程,或集萃珍贵的历史资料,或精选政治人物的说言高论,或表达史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刻观察。中国历史编纂又是长期绵延不绝、世代相续的。自司马迁撰成《史记》起,至清朝修成《明史》,历代共修成纪传体正史24部,这是自有文字以来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总卷数达3200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另外两种重要体裁的史书,编年体自《春秋》以后,有《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直至《明通鉴》;纪事本末体,有《通鉴纪事本末》至《明史纪事本末》,也各自贯通上下而自成系统。

中国古代史学如此发达,在历史编纂方面蕴涵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这本来应是明白无疑的。

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出现巨大变化,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价值遂长期被忽视。从社会环境说,是由过去与外界绝少交往变成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欧风美雨阵阵袭来。从学术条件说,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历史著作的内容,都与以前根本不同了,就史书的体裁、结构言,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广为流行,取代了以往的史书体裁。在这种情形下,很长时间内,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当代价值,甚至认为传统史学即为“封建的产物”,只是一堆史料,谈不上有其他价值。认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等于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已经凝固化了,早已失去其生命力,再不可能与当代社会、当代史学的发展发生联系了。

实际的情形当然不是如此。古代史家记载历史,包含着他们的高度智慧,他们创立的不同史书体裁不能只看到其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是表明史家选取不同的视角,去再现客观的历史进程,因而各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当今与古代,尽管社会环境与学术条件大不相同,但是如何选取合理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09AZS001)的阶段性成果。

史书形式去反映客观历史的道理却是相通的,就是说,古代著名史家的编纂思想、历史叙事的技术、成功的著史经验等,仍然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典志体因注入时代精神而凸显活力

进入近现代以后,有识史家结合时代的需要,对史学遗产加以继承、改造和再创造,由于他们的出色贡献,使传统历史编纂学获得新的进展。本文仅论述其中最为突出的两项,即:鸦片战争后典志体因注入了时代精神而凸显活力、20世纪史家对“新综合体”作了意义深远的探索。

典志体首创于《史记》的“八书”,《汉书》加以推进和丰富,完成了“十志”,以后更大为发展,产生了典志体巨著《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典志体史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主要记载典章制度和各方面社会情状,包含甚广,内容丰富多样,包括民族、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文化等,每一部分既可反映制度史、社会史的一个方面,又可储备各种知识。二是篇目的设立极具灵活性,没有固定的框框,可以根据需要作适当的增减、补充、细化,极利于反映不同时代特点,反映史家的新观察、新知识和创造性。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严重,列强对我肆意欺凌,亟须寻找御侮图强的良策,同时又迫切需要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状况、制度文化等,典志体的上述特点正适合这种时代需要,经过卓有见识的史家的采用和改造,因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产生了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魏源撰《海国图志》(1842年撰成五十卷本,不久增补为六十卷本,至1852年再次增订至一百卷)、徐继畲撰《瀛环志略》(撰著时间为1844~1848年),正如王韬所评论,成为“国人谈海外知识之嚆矢”^①。《海国图志》强烈地贯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指导思想。全书以“志”为主,同时又有“论”“图”“表”,四种体裁互相配合。“志”为主体部分,记载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军事实力以及物产、风俗、宗教等。又有《筹海篇》四卷冠于全书之首,满怀爱国义愤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成为全

书的总纲。为了给国人提供可靠的海外知识,魏源明确地将“以西洋人谭西洋”作为重要的编纂原则。当时中西接触刚刚开始,信息资料搜求甚难,魏源为此历尽艰辛,采辑西人著作计有二十余种,除部分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著作外,其余均为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著作。魏源呕心沥血纂辑和介绍大量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从五十卷本到六十卷本,增辑了仿造和使用西洋轮船、大炮、弹药和西式炮台等中外资料二十余件。至一百卷本纂成时,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篇幅达十九卷,占全书卷数近五分之一。在记美国的篇章中,他充分肯定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进步性,称其“变古今官家之局”,“公”而且“周”。^②又在《海国图志·后叙》中赞扬说“至墨利加北洲之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通过这些努力,魏源尽其所能地发挥了典志体史书容量广阔、篇目设置灵活多样的特点,以此也尽其所能地表现了本书的时代特色,因而使《海国图志》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东方世界最详备的各国史地参考文献,不但在国内影响达几十年,而且远传日本,间接酿成明治维新之活剧。《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畲于鸦片战争期间在闽粤沿海任职,因此较多接触外国事务,后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历时五年,艰难备尝,“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五年时间,“未尝一日或辍也”。^③徐氏精于史学,选择典志体成书,全书兼有“志”和“图”,记述与议论也紧密结合。他赞扬西方国家制器、航海技术之先进,同时指出其对外殖民掠夺的特点,“盖四海之内,甚帆檣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④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书中多处以赞赏的态度予以介绍,尤其褒扬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传之公论”,乃是“创古今未有之局”^⑤,所以华盛顿是西方世界第一伟人!这样的议论出自道光年间一位官居巡抚的清朝大员之口,其时代意义和远见卓识何等可贵!

晚清典志体又一名著是黄遵宪撰著的《日本图志》。黄遵宪于1877年底,以参赞身份随首任驻日公使赴日本,其时正值明治维新改从西法达到高潮之际,他的思想极受震动;他借来卢梭、孟

德斯鸠的著作阅读,从此确立了主张维新变法和拥护民权学说的思想,决心撰写《日本图志》这部明治维新的历史,向国人传达日本发生历史巨变的重要信息,以作为中国变革图强的史鉴。此书于1887年撰成,至1895年底在广州刊行,全书共40卷。黄遵宪发挥典志体适合于记述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的特点,并将之与表现日本“改从西法,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全书面貌焕然一新,被早期维新思想家薛福成被誉为“奇作”。黄遵宪在历史编纂上的创造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项。一是,强调民权思想的兴起是日本实现由弱变强的历史巨变的根本动力,首立《国统志》,作为全书的纲领,而一改通常典志体史书诸志并列的体例。《国统志》记载日本从古至今的历史大事,而重点放在明治以来的变革。黄遵宪对此有明确的概括“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⑥说明日本最大的变局是,专制的幕府统治被推翻,贵族特权被废除,走上了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国统志》又指出,由于爱国志士乘时奋起,“国家维新之治,蒙泉剥果,勃然复兴”,而平民参政,又是推动日本社会前进的关键。二是,将“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的编纂思想贯穿于全书之中。所设十二篇志,尤以食货、兵、刑法、邻交、学术诸志为重点。食货志共计六卷,分别记述租税、国计、国债、货币、商务等。详尽地介绍日本发展产业的种种措施,包括开矿山、修铁路、开办小型国有企业、大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新品种、设行业联合会、增强对外竞争力量、实行关税保护、鼓励商品输出等项,具体地证明日本“百度草创,计日程功”,“美善之政,极纷纶矣”。三是,本书有强烈的史论色彩,结合史实发表议论,直接提出救亡图强的主张。黄遵宪在书中大量地运用序、后论以及正文和小注中夹叙夹议的形式,热切地表达自己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和变革维新的进步要求,因此作者在《〈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诗中云“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吾窃比《黄书》”,将此书直接比拟为王夫之的政论著作。他批判封建专制对民众的严酷压迫“盖自封建之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

积威所劫,上之而下,压制极矣!”^⑦又极力主张对外开放,一再论证“交邻果有大益”,日本由于大力学习西方,而已“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国相抗衡”。其目的是要让国内那班故步自封、排斥学习外国长处的守旧派醒悟过来。而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赔款二万万两,在全国一片公愤中,《日本国志》的价值也被大家看清楚了!维新志士梁启超写了《日本国志后叙》,说“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有王者起,必将取法斯书。岂可以‘史乎、史乎’目之哉!”以为本书可以做变法维新的教科书。总之,黄遵宪继承了魏源史学的爱国精神,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利用和改造“书志体”以广泛记载外国政治、经济情形的撰史方法;而《日本国志》的内容又得于作者亲到日本了解、观察、访求,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在思想上明确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和采用欧美的民主政体,内容又更具系统性,因而将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更向前推进了!

“新综合体”:20世纪史家意义深远的探索

20世纪初年著名学者章太炎、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是显示历史编纂学在近现代发展重要趋势的影响深远的事件,也是传统历史编纂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明证。

探索“新综合体”,其认识根源在于对《史记》体裁之精髓的正确把握;在学术思想上,则是直接继承乾嘉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对改革历史编纂学方向的大胆设想。

司马迁创立的《史记》体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相互配合构成,一般将它称为“纪传体”,并不很准确,实际上它是一种“综合体”,以这种体裁形式来记述历史,有巨大的优越性,其中包含着非凡的历史智慧和深刻的哲理。故唐代刘知幾评价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⑧清代章学诚则赞誉说“范围千古,牢笼百家。”^⑨东汉初,班固继承了《史记》的体裁并加以调整,撰成断代体《汉书》,自此之后,历代正史的编纂在体裁上沿用不改。但是,两千年的历史编

纂学又有深刻的教训,后世修史者失去了司马迁的创造精神,墨守成规,结果史才、史学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⑩。章学诚通过长期辨析体例和修史实践,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看法,他认为,历史编纂学的这种困境,正好可从吸收纪事本末体长处来解决,所以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历史编纂学的方向。

章太炎和梁启超在20世纪初都曾计划撰著中国通史,在全书总体框架上都设想采用一种“新综合体”,章太炎主张见于《中国通史略例》一文,收入《榷书》之中,梁启超则留下《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部分书稿及当时写给陈叔通、梁仲策的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者,章太炎设计由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个部分配合而成;梁启超则设计由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个部分配合而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继承《史记》体裁气魄宏大、内容丰富、诸体配合的优点,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发展。二者,章太炎明确赞同章学诚的主张,认为是“大势所趋”。他设想的十篇“记”,是要记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诸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等,又说用“考纪”和“别录”来记人物,目的是“振厉士气,令人观感”。这些都较章学诚有所推进。三者,梁启超所撰写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都以精炼生动的文字记载主要历史事件,并评论一个阶段的历史趋势,既提纲挈领,又气势恢宏,故被张荫麟赞许为足以超过欧洲吉本、麦可来等史学名家的著作。梁启超设想的体裁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记”等都与之相配合。若将各个时期的载记连接起来,就能清晰地展现历史演进的脉络。这样安排,确比章太炎前进了一大步。梁启超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传统史学的精华有深刻的研究,他对《史记》体裁内容丰富、诸体配合、伸缩自如,和纪事本末体本末贯通、灵活变化的优点,都有中肯的评价。

罗尔纲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20世纪40年代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苦过程,而80年代中期完成了《太

平天国史》四卷本,采用了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个部分组成的体裁。他认为,运用这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来撰著历史,能够达到“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论述,又有丰富的内容”的目的。^⑪《太平天国史》在体裁上的创新,与上述章太炎、梁启超革新的方向相一致,构成20世纪史家对新综合体所作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重大史学工程所彰显的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当代价值

新时期重大史学工程公认的有两项,一是白寿彝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一是戴逸担任编委会主任的大型《清史》,它们的体裁设计和成功纂修,恰恰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其共同的编纂思想是:以传统纪传体为基本框架,充分吸收现代章节体和传统纪事本末体等的优点,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相互配合,融为一体。目的是达到在内容上能突出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趋势,又有丰富的内涵,足以反映历史的复杂性、生动性,而在形式上则根据撰史的需要灵活变通。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历时约20年,全书12卷22巨册,共计约3000万字。总主编白寿彝长期在史学史园地上辛勤耕耘,对于如何对传统史书体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何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如何进行历史编纂的创新,都有特别深刻的见解。1961年3月他撰成《谈史学遗产》的长篇文章,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史学遗产”的观念,并倡导研究和大力发掘“历史编纂学”的遗产。他阐述传统历史编纂学最值得借鉴之处:一是历史体裁的丰富性,二是要有不同于著录家的眼光,要研究史书的发展,如从《春秋》到《资治通鉴》,是从编年体的发端,到这一史书体裁的顶峰,三是对于以往史学家提出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问题以及古代史馆编纂的机构和经验,也应重视研究。进入新时期后,白寿彝先生的编纂学思想继续发展,在其重要论著《谈史书的编撰》(1981年)、《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中国通史》导论卷(1989年)中作了进一步阐发。他

明确提出要用“新综合体”来写历史。“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使全书内容融为一体。……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为了吸收古代史书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⑩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中国通史》确定了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框架体系“序说”,全面而概要地论述各卷所依据的文献资料、考古材料,本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本卷撰写旨趣“综述”,宏观地论述多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关政治、经济、民族、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各项重要制度的制定和施行等,是全书的主干;“典志”,论述各个时期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状况,包括民族、宗教、思想文化、礼俗等“传记”,记述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除了专传以外,还设立有合传、类传。1999年4月,《中国通史》全书22巨册全部出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及学术界的普遍赞誉。江泽民总书记在贺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一大喜事。”学术界则赞誉这部巨著是“20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几年中,这套大型学术著作发行数量达3万套之多。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恰恰说明这部巨著在内容的丰富和体裁的创新上都获得了成功。

大型《清史》的纂修,于2003年正式启动,预计总字数约3200万字。《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刊载有文化部长、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组长蔡武同志在2011年底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报告说:历时9年的清史纂修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部分稿件撰写进入了尾声,审改工作全面展开。《清史》体裁结构中五大部分相互配合。通纪:记述清代历史演进大势,总结其兴一盛一衰一亡的历史规律。典志:这一部分所占分量很重,据《清史目录》(第六稿),列有天文历法、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民族、职官、法律、兵、边政、邦交、华侨、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近代实业交通、财

政、漕运、盐政、钱法、礼俗、教育等志,共设立35篇志。传记:除各朝人物传记外,还设立学术、文苑、艺术、忠烈、孝义、循吏、少数民族、妇女等类传,共二十二卷。史表,有史事表、部院大臣表、总督表、巡抚表、中外约章表等,共十三表。图录:有舆地、生产、商贸、典仪、军事、艺术等,共十卷。

白寿彝先生和戴逸先生对框架结构的设计,在总体上可说是互相照应,形神兼似。两大史学工程,一是撰修贯通上下几千年的中国通史,一是撰修三百年的清代史,同样选择了综合体裁,这当然绝非偶然,其中蕴含着极其宝贵的编纂经验。集中地来讲,就是:自觉地吸收和发扬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长处,勇于改造和创新,就能使历史著作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丰富性,在历史编纂上,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体现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并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中国通史》体裁的设计还吸收了外国近现代史学著作的优点,在“序说”部分,分别概述各时期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关的研究成果等,就是借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古代东方史》等著作。《中国通史》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后却两次被列为书店上的畅销书,与“序说”的内容特别受到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欢迎,是研治各个朝代历史的入门参考书是有直接关系的。《清史》撰修之前,曾就体裁体例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开始时提出的方案分歧很大,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国家修史,就应该采用历代正史的纪传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现在是21世纪修史,必须采取流行百年的章节体,各有根据,似乎极难统一。经过充分研究后,大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大多数学者赞同采用综合体裁,就是因为从20世纪几代学者的探索中,认识到20世纪历史编纂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认识到以“综合体”来写历史是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的。清史撰修工程复杂,参加的专家人数众多,9年来却能顺利推进,学者们对框架设计的充分认同,显然起到重要作用。蔡武同志的讲话还特别提到“我们今天的清史撰修工作是国家修史、官方修史。早在上世纪60年代,白寿彝同志就提出,要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发掘、分析和研究。这个意见很重要。

在编史过程中,我们要做到古为今用,认真研究历史编纂史,深入分析以往编史思想和具体做法,科学总结编史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此言是他结合领导清史纂修工作和领导全国文化工作的亲身体会所讲,而对于我们加强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进一步阐发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当代价值,推进新世纪的史学工作,无疑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九《瀛环志略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
- ②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外大西洋·弥利坚即育奈士迭国总记》,岳麓书社1998年版。
- ③徐继畲《瀛环志略·自序》,上海书店2001年版。
- ④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闻》。
- ⑤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北亚美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 ⑥⑦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一《国统志一》,上海图书集成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印本。
- ⑧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⑩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⑪罗尔纲《太平天国·自序》,中华书局1991年版。
- ⑫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史学研究》1981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潘清)

《明史·职官志一》“三公三孤”条考辨(五)

吴士勇

继申时行还有叶向高、顾秉谦。叶向高于万历四十一年加少保,天启三年加少傅,天启三年十二月,“壬子,大学士叶向高一品六年考满,吏部具奏。上谓叶向高已经三考,历事三朝,从来阁臣所无,加上柱国太傅,荫一子为尚宝司司丞”。天启四年春正月己未,“叶向高辞新命”。天启七年八月戊戌,“旧辅叶向高、顾秉谦各加太傅,还赏银五十两,彩段二表里,加赐坐蟒一袭”(《明熹宗实录》卷四二,天启三年“十二月壬子”条;卷三八,天启四年“春正月己未”条(梁本);卷八七天启七年“八月戊戌”条,第2217、2228、4205页)此时叶向高已致仕在家,竟无从请辞。顾秉谦为天启年间内阁首辅,天启三年加少保,天启五年加少傅、少师。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元辅顾秉谦特加进光禄大夫、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世袭”。天启六年闰六月丁未,“吏部奏大学士顾秉谦三年考满,得旨,著仍前辅理,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师,支尚书俸,余官照旧”。天启六年九月庚寅,顾秉谦“屡疏乞体,上从所请,加太师,荫一子尚宝司司丞”。顾“疏辞,许之”。(《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辛卯”条;卷七三,天启六年“闰六月丁未”条;卷七六,天启六年“九月庚寅”条,第3375、3531、3683页)顾秉谦加太师至

疏辞已有三个月,次年八月,他又与叶向高一起加太傅。顾为人固不足论,其位加太保、太傅、太师却透露出,张居正之后,内阁辅臣只要考满合格,或遇国家重大庆典,就可逐级擢拔,直至太师,并无“文臣限三孤”之限定。

崇祯即位后,求治太急,走马灯似更换内阁辅臣,辅臣想考满称旨多不可得。能入崇祯帝法眼的首辅有“大奸似忠”的温体仁和“贪腐圆滑”的周延儒。温体仁号称“孤忠”,越被攻讦位置越稳。崇祯五年加少保,崇祯六年加少傅,崇祯七年加少师,崇祯十年春正月辛亥,“叙边功进温体仁太保,荫中书舍人”(《崇祯实录》卷一〇,崇祯十年“春正月辛亥”条,第301页)。周延儒两次入阁,老成世故,崇祯帝为之蒙蔽,尝“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八《奸臣·周延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29页)。然而周延儒并无才略,且贪腐成性,明末军国大事糜烂不可收拾,作为内阁首辅的周延儒却束手无策。就这样的人物却于崇祯三年加少保,崇祯五年加少傅,崇祯十四年加少师,崇祯十六春正月乙巳“入直,寻进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荫中书舍人,赐金币”(《崇祯实录》卷一六,崇祯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条,第462页)。